

论麦克尤恩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①

李 涯

摘 要：在乌托邦文学传统影响下，英国当代重要作家伊恩·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呈现出反乌托邦的特征。本文考察了他三个阶段的代表性作品《水泥花园》（1975）、《时间中的孩子》（1982）、《追日》（2010），认为这三部作品在形式上与英国乌托邦文学都具有互文性关联，意蕴上则分别颠覆了田园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所构拟的“美丽的新世界”。

关键词：《水泥花园》《时间中的孩子》《追日》 反乌托邦叙事

DOI:10.13760/b.cnki.csalt.2017.0076

一般认为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乌托邦思想的第一次有意识的书面表达，然而“乌托邦”一词的正式诞生却在千年之后。16世纪的英国作家托马斯·莫尔将两个希腊词：Eutopia（好的地方）Outopia（没有的地方）融合在一起，创造出一个新词 Utopia（不存在的好地方）。由此，乌托邦的能指与所指结合，从外延到内涵都清晰地标识出人类变革社会的美好理想和信念。

从文学层面上来说，乌托邦文学因莫尔的小说《乌托邦》而正式诞生于英国。正如中国学者刘象愚所指出的“莫尔不仅创造了‘乌托邦’这个字，而且创造了‘乌托邦’这样一种新的文学体裁”。^② 纵观16世纪以来的西方文学，没有哪个国家如英国这般热衷于创作乌托邦小说。无论从作家群体的广泛性，作品的数量、质量，还是从时间上的延续性来看，英国的乌托邦小说创作都是西方文学的典范。可以说，自16世纪开始，乌托邦小说创作就成为内在于英国的一种文学传统。在这种文学传统之中，涌现出许多世界性影响的作品：自《乌托邦》之后，17世纪有培根的《新大西洋岛》，18世纪

^① 本文系四川省教育厅一般课题“伊恩·麦克尤恩小说与西方当代文化权力的结构转型”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14SB0042。

^② 刘象愚：《反面乌托邦小说简论》，《外国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

有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和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19世纪有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而到了20世纪，英国乌托邦文学转向反乌托邦，从想象天堂转向了表现地狱。^①出现了如乔治·奥威尔的《198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等著名的反乌托邦小说。

英国当代著名作家伊恩·麦克尤恩自20世纪70年代开始创作以来，已经发表了12部长篇小说和2部短篇小说集，获得了包括布克奖、毛姆奖等在内的英国所有主要文学奖项，这些创作成就，使他成为国内外研究者的热切关注对象。若将他的作品放入英国乌托邦文学传统之中来考察，将会发现其创作也在这种文学传统之中深受影响，致使其系列小说都具有反乌托邦色彩。但是与安东尼·伯吉斯的《发条橙》、多丽丝·莱辛的《史卡斯塔兰》等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一些同属于英国乌托邦序列的小说相似，麦克尤恩的这些反乌托邦性质的小说不再有着非常明显的乌托邦文学样态，难以一眼就分辨出来，而需要研究者从外在形式和主题意蕴上加以认真的分析和考察。

传统的乌托邦书写主要可以分为三种：田园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科技乌托邦。田园乌托邦企图构拟一个类似于“伊甸园”一般自然和谐的田园社会，如19世纪莫里斯的《乌有乡消息》；政治乌托邦的重点在于讨论社会政治制度，如16世纪莫尔的《乌托邦》；而科技乌托邦则描述一个科技理性让生活更美好的未来图景，如18世纪培根的《新大西洋岛》。正如克利杉·库玛指出的，乌托邦思想是建立在“人性善”观念上对理性的推崇上的。^②具体到不同种类的乌托邦书写，则分别有其强调的重心：在田园乌托邦是人性的善，在政治乌托邦是政治理性，科技乌托邦则是科技理性。

麦克尤恩的小说创作按题材和风格的变化一般被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74到1986年；第二阶段从1987年到20世纪末；第三阶段则是新世纪的最近十年。考察其三个阶段的代表性的作品《水泥花园》(1975)、《时间中的孩子》(1982)、《追日》(2010)，可以发现，这三部作品在形式上与英国乌托邦文学都具有互文性关联，意蕴上则分别颠覆了田园乌托邦、政治乌托邦和科技理性乌托邦所构拟的“美丽的新世界”。本文将以此三部作品为例，分析麦克尤恩小说的反乌托邦性。

① 反乌托邦文学是乌托邦文学的发展延续，仍然属于乌托邦文学的一个部分。

② 参见 KrishanKumar. *Utopia and AntiUtopia in Modern Times*. Oxford: Basil Blackwell, 1987.

一、《水泥花园》：反田园乌托邦

发表于1975年《水泥花园》是麦克尤恩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以一个15岁的男孩杰克的视角，讲述了一个“发生在一个孤岛的孩子们的故事”，这个故事包含了弑父、自赎、乱伦等禁忌题材，是麦克尤恩早期创作的代表性作品。杰克的父亲身患疾病，无法打理家中花园而决定用水泥将花园铺平在，然而在劳动过程中突发心脏病死去。不久，母亲也因疾病去世。剩下15岁的杰克及17岁的姐姐朱莉、13岁的妹妹苏和6岁的弟弟汤姆。为了防止外力介入家庭，他们决定隐瞒母亲去世的消息，并将母亲的尸体用水泥封固在地窖中。从此四个孩子过上了自我封闭的生活，最终因乱伦而被外人所发现。

《水泥花园》小说名本身已经暗示出这部作品的反乌托邦特质。乌托邦文学总是首先在空间或者时间上“他者”化。从早期的乌托邦文学来看，空间上的封闭隔绝是乌托邦文学作者的第一步程式。正如詹姆逊所言：“封闭使系统或想象的存在成为可能，它也使此处成为他处。在莫尔那里，封闭是由乌托邦的建造者们在岛屿和大陆之间所挖掘的巨大沟壑造成的，它在首要的意义上使乌托邦的存在成为可能。”^①无论是托马斯·莫尔的《乌托邦》、斯威夫特的《格列佛游记》，还是笛福的《鲁滨逊漂流记》，无一不在文中设置出一个空间上隔绝的“孤岛”般的地域，在这个与茫茫现实世界隔绝的地域中，有着作者理想的完美的社会形态。

《水泥花园》中主人公的家是一幢有着花园和地窖的两层楼房，但开篇父亲即用水泥将家园的四周铺建成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并且房子周围的其他居民房也基本上都被拆光了，这幢房子就如遗世独立的孤岛一般屹立在这个荒凉的街区。随着父母先后去世，四个孩子将母亲的尸体用水泥封存在地窖，并且自我封闭在家中，拒绝和外界来往时，“水泥花园”的“孤岛”意象则更加浓重起来。

然而，虽然与传统乌托邦文学的“孤岛”环境设置相呼应，“水泥花园”中却并没有被孩子们构建成一个乌托邦般的天堂。相反，在“水泥花园”中发生的故事，与20世纪英国反乌托邦小说戈尔丁的《蝇王》有着明显的互文关系。《蝇王》同样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孤岛上的孩子们的故事：在一场未来的核战争中，一架飞机带着一群孩子从英国本土逃离时被击中降落在一座荒无人烟的珊瑚岛上。幸存的孩子们很快分裂成了两派，一派坚持理性和秩序，

^① 弗里德里克·詹姆逊：《未来考古学》，吴静译，译林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头领名叫拉尔夫；一派崇尚本能和欲望，“人性恶”逐渐激发，头领名叫杰克。故事最终以杰克派战胜拉尔夫派告终，亦即人性恶最终战胜人性善，黑暗吞噬了光明。必须指出的是，对《蝇王》的反乌托邦性的理解也要放在英国乌托邦文学序列中去看待。《蝇王》的出现要直接追溯到1885年英国著名作家巴伦坦的作品《珊瑚岛》。这部乌托邦性的小说讲述的是三个孩子拉尔夫、杰克、彼得金海上遇险漂流到一个美丽的珊瑚岛，他们在岛上过着自由悠闲地天堂般的生活，并且凭借勇敢和机智营救后漂流到孤岛上的食人族的俘虏。小说勾画了一幅善战胜恶的传统格局，肯定和歌颂了人性之美好。从形式上看，《蝇王》几乎脱胎于这部小说。主人公名同样是拉尔夫、杰克；同样漂流到孤岛上；这些孩子们还在漂流到岛上后欢呼流落之地正是“珊瑚岛”“和书里写的一模一样”，^①。然而，正如前文所述，《蝇王》出现目的本身却是为了成为光明的乌托邦作品《珊瑚岛》的黑色影子，它反叛的正是前者所勾勒的“孤岛变伊甸园”的乌托邦模式。而《水泥花园》同样是《蝇王》的互文性作品，在某种程度上，同样是讲述“孤岛中的孩子的故事”，同样是反叛“孤岛变伊甸园”的乌托邦模式；而麦克尤恩将《蝇王》中代表“邪恶杰克”作为了《水泥花园》中主人公名，其中的互文性暗示更是不言自明。

除了在上文指出的环境设置和人物形象与上述的乌托邦作品有互文性关联外，《水泥花园》在意蕴上也有浓厚的反田园乌托邦性。田园乌托邦首先强调的是人与自然的和谐，表现人健康地生活在生机盎然的自然世界中。但在“水泥花园”中父亲脸手发黄、患有心脏病，母亲也终年体弱多病，两人先后因病去世。这个封闭空间中充斥着疾病和死亡的阴影，隐喻着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对立。父亲用水泥将家园的四周铺建成寸草不生的不毛之地，水池中象征着生殖的潘神像的倒塌等，更是意味着人对自然生机的彻底破坏。

在人与自然和谐的基础上，田园乌托邦更突出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人与自我关系的和谐。而在这个以水泥构建的“乌托邦”里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兄弟姊妹关系以及人与自我的关系全部处于一种对立扭曲变态的状态之中，使得这个阴冷可怕的空间存在成了名副其实的“恶托邦”^②。杰克的父亲性格如水泥般冷硬，在家中独断专行、说一不二，若母亲稍有异议，“他知道怎么利用他的烟头来对付她。”^③ 夫妻关系如此对立，亲子关系也并不亲密。孩子们都畏惧这个暴躁冷硬的父亲，他从未对子女表现出仁厚的父爱，反而是冷

① 戈尔丁：《蝇王》，龚志成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② 反乌托邦因其勾勒一个与乌托邦相反的“坏地方”“邪恶之地”又被称为恶托邦。

③ McEwan, Ian. *The Cement Garden*. published by Anchor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2003. 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注出。

漠嘲笑和侮辱。小说第一句话即：“我父亲不是我杀的，可我有时觉得是我促他走上了不归路。”事实正是如此，由于父亲对待子女的冷漠粗暴，才导致了“我”对他的憎恨，以至故意在抬水泥袋时让父亲与暗中“我”比赛体力，最终导致父亲心脏病发作而死亡。因此，亲子之间的对立最终导致了“弑父”的意向产生和行为的最终实施，这是怎样可怕的伦理悲剧。

而在父母去世后，“我们”愈加沉沦在这幽闭孤独的“恶托邦”内。在这幢苍蝇遍布、地窖中传来尸臭的房子里，我和姐姐朱莉从之前的相互“检查身体”逐渐发展成了实质上的乱伦；六岁的弟弟汤姆的性别取向发生紊乱，从穿衣打扮到行为举止，都试图成为一个女孩。而叙事主人公“杰克”自己，由于长期手淫而手上散发出“鱼腥味”，怎么清洗都无法去除；在一次照镜子时，镜中的自我朝自己大吼着：“狗屎……臭尿……屎眼”。可见，“我”除了与姐妹弟弟的关系扭曲疏离之外，与自我之间的关系也是对立的。

英国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曾言：“世界地图如果不包括一块乌托邦，就根本不值得一瞥，因为它缺少承载人性的地方。”^①显然，他所谓的“人性”的假设前提是“善”而非“恶”。但正如张隆溪指出的，“如果说乌托邦以人性善为基本前提，反乌托邦思想家们则对人性持悲观的看法。他们强调人性的阴暗面，认为人是罪恶而且堕落的。如果任其自流，他们往往尔虞我诈，自相残杀，所以不可能建立任何理想的社会。”^②从戈尔丁的《蝇王》到麦克尤恩的《水泥花园》，都流露出对乌托邦式的“人性善”提出质疑。正是人性本恶，所以无论是“珊瑚岛”还是“水泥花园”中，都最终成了人间地狱。即便是看上去最天真的孩子，也无法如卢梭所认为的那样能构建出一个田园般的理想社会。

二、时间中的孩子：反政治乌托邦

除了在“空间”上将“乌托邦”的设置与现实世界隔离开来以外，一些乌托邦作品也从“时间”上将“乌托邦”变为现实世界的他者，如20世纪的反乌托邦作品《1984》《美丽新世界》等均是“乌托邦”设置在了遥远的未来。因此，从“时间”的角度来看，发表于1987年的长篇小说《时间中的孩子》的反乌托邦性非常明显。麦克尤恩将故事发生的时间设置在了未来：写作时间的十年后，即1997年左右在这部小说创作的1987年前后，正是被誉

^① Wilde, Oscar. *The Soul of Man Under Socialism*. 1891. Rpt, Forgotten Books, 2008, p. 18.

^② 张隆溪：《观念与实践》，《读书》1998年第12期。

为“铁娘子”的撒切尔夫人执政时期，而故事中被麦克尤恩故意模糊了性别的英国“首相”，暗示着撒切尔夫人十年后依然掌控着英国政坛。

在主题意蕴上，这部小说也具有鲜明的反政治托邦特征。故事的主人公斯蒂芬是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受邀参加英国官方育儿委员会的会议，和众多社会名流一起连续几个月、每周一次讨论如何制定代表国家意志的儿童教育规则。冗长的会议上，斯蒂芬的思绪始终萦绕在两个人身上，一个是两年前他在超市丢失的三岁女儿凯特；另一个则是自己的好友、政治家查尔斯，他在炙手可热时突然宣布退出政界，回到乡下隐居。小说最后以查尔斯自杀，而斯蒂芬与妻子重新生下一个孩子为结局。小说通过两个事件来表现政治权力对个人生存空间的控制和压抑。

第一是官方育儿委员会制定《权威育儿手册》。育儿本属于公民私人领域的个人行为，但在麦克尤恩设想的未来英国，则成了一件官方出面进行强力干涉的事件。在英国政府的理念中，“这个国家到处都是不合格的公民”^①，因此为了把小孩培养成未来的理想公民，需要从他们婴儿时期就采取严格的管教措施。为了达到这一目的，英国政府成立了官方育儿委员会，下设十四个小组，分别就孩子的衣食住行以及拼写阅读等各个方面进行规定。最重要的是，要求父母树立在孩子面前的权威：“一声响亮的耳光事半功倍”、“服从带来安全”“纪律严明的头脑”等字句强调的是家长的权威、孩子的服从，以及权威给孩子带来的效果。政治权力并不以介入亲子关系为目的，它所诉求的是所有公民的服从，这种对于权威的天然的服从，应该从婴儿时期就得到训练。表面上《权威育儿手册》是以民主讨论的形式形成的，但斯蒂芬很快发现，十四个小组长达几个月的讨论其实都是英国政府制造的民主烟幕弹，早在会议召开之前，《权威育儿手册》就已经写作完毕。为了突出《权威育儿手册》所象征的国家政治权力对于个人日常生活的控制和影响，麦克尤恩在小说形式也做出了安排，他将小说每一章都以《权威育儿手册》中的片段作为题词，如“父亲越是无微不至地关心照顾小孩，他就越不能树立自己的权威”“应该记住，童年不是自然现象。童年是一项发明，是社会的一个构成部分”等等，将主人公斯蒂芬的个人生活放在这种由威胁性权力话语营造出来的紧张氛围之中。

另一个表现政治权力对于个人生活控制和干预的事件，发生在斯蒂芬的朋友查尔斯身上。

^① McEwan, Ian. *The child in time*. published by Anchor Books,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New York, 1999. 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此版本，不再注出。

查尔斯早年是一个出版商人，从政之后由于才干出众而获得首相的赏识。然而，让查尔斯无法忍受的是，他发现首相安排情报机构军情五处二十四小时的监控他的电话、跟踪他的行踪，这让查尔斯愤然退出政界，和妻子到归隐乡间。斯蒂芬应邀去乡间看望二人时，发现年近半百的查尔斯已经“退化”成了一个着迷于童年玩弹弓、建树屋游戏的十岁的孩子。然而政治权力并没有因此放过查尔斯，当他自以为已经完全摆脱首相的控制时，首相却寻找各种途径要求他回归政坛。当意识到永远也无法摆脱政治权力的控制时，查尔斯最终选择以死反抗。这部小说的从故事情节到人物类型，都更类似于传统的反乌托邦小说。在反乌托邦三部曲中，人物类型上都有着一个是代表政治极权的君主型人物和一个与之相对的叛逆者。^① 这里的查尔斯就是叛逆者的形象，而首相则是政治极权的代表。这种人物关系的设置具有明显的反乌托邦小说特征。

需要指出的是，小说的名称《时间中的孩子》已经提醒了读者关注作品中两个表现对象：孩子和时间。但是很明显的是“孩子”并不是这部作品的主角，而是更多在功能上作为一个能指指向人的天性的张扬和个人的自由。而“孩子的丢失”，则象征人的天性的压抑和自由的丧失，这是政治权力对个人生存空间控制压抑的结果。对于“时间”的表现也是这部作品的特色之一。麦克尤恩不仅将“时间”放在小说名中以强调其重要性，更是在故事中安置了一个“科幻”情节来引出自己对于“时间”的理解。丢失女儿后的斯蒂芬在去看望分居妻子的旅途中经历了一场“时间幻境”：“成年后的斯蒂芬回到过去，促使母亲生下了自己。”他无意穿越了时空，来到一个叫作洪钟酒吧的建筑物外，从窗口向内看到了自己年轻时期的父母，正在为未婚先孕是否应该生下自己而发生争执。当母亲抬头看到窗口的查尔斯幻化成婴儿的脸时，她决心要生下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孩子。斯蒂芬对这次神秘的遭遇困惑不解，在请教了量子物理学家、查尔斯的妻子特尔玛之后，他恍然大悟，并回忆起童年读过的英国诗人艾略特的《四个四重奏》的诗句：

现在的时间和过去的时间
可能都体现在将来的时间里，
而将来的时间却包含在过去的时间中。

众所周知，《四个四重奏》的主题就是“时间”。麦克尤恩苦心孤诣设置将这个“科幻”情节和艾略特著名的“时间诗”联系在一起，无非是为了引

^① 叶·扎米亚京的《我们》(1924)、阿道司·赫胥黎的《美丽新世界》(1932)以及乔治·奥威尔的《1984》(1948)，被称为20世纪文坛的“反乌托邦三部曲”。

出他对于“时间”的认知：现在的一切都由过去决定，将来的一切都由现在决定。这种对于“时间”的认知和强调是与这部小说的反乌托邦主题表达相契合的。麦克尤恩正是通过虚构这种政治权力对于个人生活空间的干预和控制的故事，表达他对于当下现实政治的忧虑与批判，并暗示改变的可能。80年代的英国在撒切尔夫人的领导下可谓保守主义当道，保守主义价值观所推崇的强力政府、对社会秩序的强调、对纪律性的重视等理念对于麦克尤恩这种经历了60年代反文化浪潮洗礼的自由主义作家来说格格不入。与反乌托邦小说《1984》《美丽新世界》等故事发生在遥远的未来不同，《时间中的孩子》的故事发生时间与写作时间相隔仅仅十年，对当下政治的指涉性之明显，只能说明作者希冀改变的欲望之急迫。因此，作者在这部反乌托邦性作品的最后又设置了一个“乌托邦”式的结尾：正如斯蒂芬能够“回到过去拯救自己”，那么他也能够“医治当下拯救未来”，查尔斯的自杀促使斯蒂芬等人警醒到政治权力对于个体的压抑与控制，他和妻子重新生下一个孩子，为了这个孩子，决定要“医治一切人和一切事：政府、国家、星球”，赋予“未来的英国公民”一个无强权干涉的自由的生活环境。

三、追日：反科技乌托邦

《追日》发表于2010年，这部小说文的英文原名为SOLAR，意为太阳、太阳光、太阳能。在西方文化的源头古希腊文化那里，太阳神阿波罗是光明、正义、理性的化身。可以说，“太阳”这个符号本身就具有乌托邦的意义，它代表了人类对于光明、自由、理想生活的向往与追求。对太阳的乌托邦符号意义的理解影响到后世作家的乌托邦文学创作，如17世纪意大利作家托马斯·康帕内拉乌托邦小说名为《太阳城》，艾阿姆布拉斯的乌托邦小说名为《太阳岛》等。而同样将“太阳”作为小说名，麦克尤恩的这部作品描述的却不是一个有着光明未来和希望的人类社会，而是一个即将因全球气候变暖而走向危机的惶恐世界。

故事的主人公叫迈克尔·贝尔德，他早年因“别尔德——爱因斯坦合论”而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此后在一家名为“全英可再生能源中心”的政府机构担任一把手。这家政府机构致力于为“全球气候变暖”寻求应对之道，别尔德因此开始担当起所谓拯救人类的伟大使命。然而事实上，如今的别尔德已经完全堕落成了一个靠昔日的余晖挂职大学、开收费讲座、收取媒体出场费等赚取金钱的学术花瓶，对于如何解决全球的生态危机没有任何心得和兴趣。科研上毫无建树，在私生活上别尔德更是一塌糊涂。他“撒谎成性，

阅女无数”，导致五次婚姻全部以失败告终，之后他还卷入了一起“情杀”案件之中，为报复妻子的情人而做伪证害其陷入牢狱之中。故事的最后，别尔德陷入了事业与生活的双重危机中：事业上，他被发现剽窃了科研助理奥尔德斯的成果而将受到法律的追究；生活上他因对任何一段情感都不忠而即将失去唯一的孩子。

正如上文所述，小说名 SOLAR 所指的“太阳”，在西方文化文学中是一种象征着光明、美好、理性的世界的乌托邦符号。而与小说名形成反讽的是，小说内容却呈现的是世界的生态危机和被期望承担拯救世界重责的科学家荒唐混乱的生活。因此，从小说名称和内容之间的张力来看，《追日》是对乌托邦思想的一种嘲讽，具有隐藏的反乌托邦性。

除了用名称与内容之间张力来暗示作品的反乌托邦性质外，《追日》还通过塑造了一个“反科学家”形象来表达对于科技理性的怀疑和讽刺。科技理性是科技乌托邦文学的基石。正如有论者指出的，科技乌托邦建基于对科技理性的推崇之上基础，认为“以现代科技为根本依托对未来社会进行理想设计，主张以科技理性为范式主导和规约人类未来，相信科学技术必定实现物质丰裕、秩序合理、自由正义与社会和谐的人类理想”^①。然而这种科技乐观主义在 20 世纪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诟病，并引发了反乌托邦小说对其的深刻批判。在《我们》《美丽的新世界》等反科技乌托邦小说里，人类失去了对生老病死自然生命历程的体验，而被迫人工授精、机器孵化，用迷幻剂保持始终的“满足与激情”。这所谓的科技构建的“美丽新世界”其实是科技极权对人的压抑与控制，是与政治“恶托邦”所不同的另一种科技“恶托邦”。

麦克尤恩的《追日》同样也建基在对科学理性的批判之上。然而，不同于经典反乌托邦作品设置一个“恶托邦”来对“乌托邦”进行讽刺和解构，《追日》对实现“科技乌托邦”的主体——科学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和解构。也就是说，在以往无论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的作品中，作为科学主体科学家，他们的理性形象本身就代表着科技理性。然而《追日》这部作品，正是通过对科学家理性形象的解构，来表达对“科技拯救人类”理念的怀疑。如果说，经典反科技乌托邦是对“结果”进行否定，那么《追日》则对“起点和手段”进行了怀疑。

自 20 世纪以来，物理学对人类社会的进程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而物理学家也成为大众关注与仰慕的对象。在大众心目中，一个科学家，特别是获得过诺贝尔物理学奖的顶尖科学家，他应该是科学的研究者、科学技术的

^① 鄂晓燕：《科学乌托邦主义的多维结构及其启示》，《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9 年第 6 期。

发明者和拥有者、科学理念的秉持者，甚至作为他本人，就是科学理性的肉体化身。因此，无论是在事业上，还是生活上，他都应该是全然理性的，遵循科学规则和生活规范的，是世人的榜样、社会的楷模。

然而麦克尤恩笔下的这位物理学界的精英科学家别尔德，却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反科学家”形象。他矮胖猥琐，不遵守任何规则规范，5次婚姻都因为他的不忠出轨而失败，每次婚姻都仅维持了5年多。可以认为，麦克尤恩为别尔德安排的婚姻次数和维持年限，都涉及数字“5”，这并非没有考虑。在传统的乌托邦文学中，作者为了显示“乌托邦”的理性特征，都会提出自己的数字原则。比如柏拉图笔下的乌托邦性质的城市亚特兰蒂斯用“5”来作为城邦结构的数字；在毕达哥拉斯学派那里，“5”这个数字象征着“完美的结合”。^①如果说，“5”这个数字有着乌托邦的符号意义的话，那么别尔德在私生活上对于“5”的破坏，无疑是一种对于乌托邦理想的破坏。而离婚之后的他，生活更加陷入了混乱无序中。公众心目中的科学家应该生活在窗明几净、整洁有序的环境中，别尔德却独居在一个肮脏潮湿的公寓中，天花板上长着蘑菇、黏糊糊的地毯上胡乱对着报刊杂志和各种空酒瓶，苍蝇蜘蛛跳蚤横行，所有家具、包括床单被褥都凝结起污垢。这并非为了渲染他忙于科学研究而忽略个人生活，而是为了表明他内心的荒唐混乱。这样一个科学家，如何能够担负起拯救世界的重责呢？别尔德确实无能为力。在科学研究上他除了过时的“合论”外毫无建树，跟不上最新发展的物理学理论，听不懂科学助理们的学术谈话。他依靠各种讲座、各种头衔谋取名利，甚至为了金钱剽窃死去的科学助理奥尔德斯的科研创意。

大众所倚重和期望的精英科学家如此寡廉鲜耻，那么整个科学界又如何呢？麦克尤恩笔下的科学界也充斥着唯利是图之风。科学家们依靠政府或者商业财团支助进行科研，获取资金支持成了科研目的而非手段。为了迎合政府和财团，科学家夸大或者抹杀事实，甚至提供虚假数据。在全球变暖问题上，各国政府都采取了系列措施加以应对。而科学界也提供数据证明各种措施的有效性。然而，别尔德等科学家对这些数据的真实性心知肚明。麦克尤恩借别尔德的手下哈默之口，点出了事实的真相：“他们说科学家搞错了，却又不承认。这座产业链上已经集中了太多的职业和荣誉。”^②

因此可以认为，麦克尤恩对于科学理性的怀疑与否定，直接表现为对科学家以及科学家群体的怀疑嘲讽上。《追日》解构了作为科学主体的科学家的

① 牛红英著：《西方乌托邦文学研究》，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5页。

② 伊恩·麦克尤恩：《追日》，黄昱宁译，译文出版社，2012年。本文所引原文均出自此版，不再注出。

理性客观形象，也就解构了科学理性的神圣性，并表达了作者对“科学拯救世界”“科学让未来更美好”等科技乌托邦思想的深刻反思与批判。

结 语

可以说，麦克尤恩小说的反乌托邦叙事是在一种文化传统下写作的结果。这种文化传统就是英国自16世纪以来开始出现并壮大的乌托邦文学及其在20世纪的衍生物——反乌托邦文学创作。在这种强大的传统影响下，他的小说或者在环境设置上，或者在人物塑造上，或者在主题意蕴上，都带有反乌托邦特质。此外，小说家的创作风格还与他自身所处的时代和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麦克尤恩来说，他青年时代经历过西方轰轰烈烈的1968“反文化”运动，是“反文化”运动的积极参与者。“反文化”运动对于权力的抵抗，是麦克尤恩的思想底色，也影响到他自身的创作。^①必须指出的是，正如上文分析的那样，麦克尤恩的小说不是传统的反乌托邦小说，但他将这种小说从内容到形式都化用在了自己的创作中，从而形成了一种新的风格。正是这种风格，可以看作英国乌托邦小说创作传统在新时代的一种发展和嬗变。

作者简介：李涯，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

^① 请参见李涯：《仪式抵抗：青年亚文化视域下的麦克尤恩早期创作》，《中外文化与文论》第29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5年。